

湖北作家论丛

湖北大学中文系湖北作家研究室编

第4辑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 录

论现代鄂籍作家研究的意义、出发点和

方法论问题…………… 黄曼君 (1)

“新时期文学格局中湖北中青年作家创作走向”专辑

文化的根基与文学的发展…………… 蔚 蓝 (11)

——新时期湖北文学话题之二

一个世界破碎了, 而另一个世界尚未建成…………… 刘川鄂 (24)

——方方创作三题

悲剧的流产…………… 聂运伟 (35)

——评池莉《烦恼人生》与《不谈爱情》

人与时间的对话: 沈虹光戏剧随想…………… 冯黎明 (45)

人格错位的人生悲喜剧…………… 李俊国 (54)

——叶大春小说创作剖析

费力的诗意渴求…………… 昌 切 (64)

湖北青年诗歌创作论略…………… 羊 子 (70)

汉正街: 钱与道义的默契…………… 蔡凯如 (79)

——评任常《风流巨贾》的追求

任常印象记…………… 蔡凯如 (90)

· 现代湖北作家研究 ·

- 论秦兆阳长篇小说《大地》的艺术成就····· 童秉国 (93)
试论叶君健的创作····· 熊显长 (105)
光荣的寂寥: 废名的创作····· 杨建文 (116)
赘漪“资产阶级女性”说质疑 (来稿摘要) ····· 储 坚 (128)

· 海外湖北作家评介 ·

- 张秀亚及其小说····· 李秀成 (132)
郑明娸散文理论体系初探····· 涂怀章 沈嘉达 (141)
嚶其鸣矣, 求其友声····· 天 青 (155)

——记鄂籍女作家、台湾师大教授郑明娸与湖北大学
同行的一次座谈

· 古代湖北作家研究 ·

- 论宋玉《九辩》的悲秋模式····· 孟修祥 (160)
黄香和他的赋作····· 隼 人 (167)
唐代诗人朱放论略····· 蒋 方 (174)
五代荆南文学概论····· 刘尊明 (183)
两位湖北作家的《射阳先生存稿序》····· 宋克夫 (199)

——兼考湖北作家与吴承恩之交游

- 武昌才女呼文如与万历文化····· 周晓痴 (206)
晚明文艺革新与黄冈····· 贺亚先 (216)

· 学术动态 ·

- 全国首次胡风文艺思想学术讨论会撮要····· 鄂 文 (223)
湖北省现代文学学会 1990 年度学术研讨会综述 ····· (227)
编后小记····· (234)

论现代鄂籍作家研究的意义、 出发点和方法论问题

黄曼君

关于现代鄂籍作家研究问题，是今年我省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讨论年会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个议题在《湖北作家论丛》上已经讨论得相当深入了。但在全省范围内，由四十多位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会议形式的探讨还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讨论首先着眼的还是鄂籍作家研究的出发点和意义的问题，进行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和评价标准、价值尺度的问题。好在任何单个作家的微观探讨都要与目的论、方法论等问题的宏观审视相结合。关于这种结合《论丛》的一些论文已探讨过，但将这种结合反复螺旋式推进的研究路子仍需经常进行，因此我想再从整体上谈谈意义、方法等问题似乎仍然有必要。

我以为，进行现代鄂籍作家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既是对我国现实和历史进行文化反思的需要，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需要；又是文学本身发展的需要，是发展地域文化、乡土文学使中国新文学充分具有本民族特色，从而进一步构筑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点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批评工作中，随着对“文革”的政治反思之后有深沉的文化反思。这种文化反思在自审意识上应该是双向的：它既应是剔除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弱点和劣根性的反思，又应该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和爱国心的反思。而在这种自审性文化反思的双向进程中，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重视地域文化和乡土文

学的研究既可以促进审视、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工作深入进行，又可促使文学更看重生活和艺术本身，使作家更好地深入生活，从本民族本地域最富特色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时代精神、现代意识与真切的生活感受结合起来，在自己最熟悉的描写领域和题材中游刃有余、拓开新境。如果仅仅追逐新观念，甚至耽于玄想，容易以理念代替生活，出现新的公式化、概念化毛病；或者仅仅专注于作品的语言、文体，用文体纯形式取代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观点，也会使作品丢失与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从而使文学形式变得飘浮、抽象，也会导致形式上的公式化、程式化倾向的产生。这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作家在充分发挥主体性的同时沉入到生活的漩流和底层中去，而提倡地域文化和乡土文学，或者重视作家与家乡故土在精神上、文化心理和艺术气质上的血肉联系，则大大有利于这种深入。尼采说过：“我恳愿你们，我的兄弟们，忠于地。”^①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曾引用尼采这句话：“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又说：“现在的思想文艺界也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这种“普遍的约束”，就是“太抽象化”，“执着一个普遍的要求，努力去写预定的概念”。他告诫说：“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他说：“我们的希望即在摆脱这些自加的锁钮，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主张作家们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②周作人正是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出发重视作家与故乡本土的联系。在我们今天的

① 《察拉图斯忒拉》。

② 《地方与文艺》。

历史条件下，文学的“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当然要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与新的时代精神和历史的、现实的内容交融在一起，但今天的文学仍需发展地域文化、乡土文学，或者还需重视作家的“土气息、泥滋味”，重视培植“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国民性、地方性和个性”，使作家真正植根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去，这是坚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问题，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其次，还要看到的是，新时期后几年文学表现的重心又进入到新的层次——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层次，这就不仅涉及到文学地方色彩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地方方言等方面的问题，而且更涉及到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心灵、心理素质。它们通过代代相传的深层心理因素，以及作家们的“童年记忆”而被承传下来。这里所说的“童年记忆”不仅是指作家们成年时对童年时代的有意识的记忆，更是指他们在童年时期通过某种刺激物而引起的无意识的记忆。这种在实践中生成的，在长远的社会历史“积淀”中形成的，由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以及意识所构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必然与传统的、现实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对现代鄂籍作家，注意他们与楚文化在精神上、文化心理结构上、艺术表现上的关系，因此对于现代鄂籍作家，注意梳理和剖析他们与楚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整个中国新文学多层次的文化构成，更清楚地了解新文学于政治、文化、审美多方面的价值系统。

由上所述，可见无论从文化反思剔除国民性弱点、弘扬民族精神和文化来说，从文学植根人民生活，促进文学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三者结合的需要来说，还是从文学向文化心理结构更深层次进行开掘来说，重视现代鄂籍作家的研究都是必要的。

俗话说“唯楚有才”。这话虽然有点夜郎自大之嫌，但在楚文化的母体中经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与新颖的现代文明的交融确实孕

育了整整一代文豪，即以现代文学来说，例如，诗人、学者、战士的闻一多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史上，继屈原、辛弃疾、陆游之后专门写爱国诗的唯一现代诗人。他的诗歌中的楚文化因素是较为明显的：如情感的炽烈、歌吟的沉宏、对祖国的执着的爱直接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衔接着，诗中个性的表现既自由奔放又真挚深厚；人格修养上既注重天生的“内美”，又注重后天锻炼的“修能”；既有活跃、大胆的审美意象，又重视通过完美、整饬的形式将情感对象化、客观化等等。剧作家曹禺是面向世界潮流的民族话剧艺术大师。他的剧作深入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时代的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土壤中，熔铸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和心理内涵，具有深沉的历史悲剧感、人类命运感。熔中外戏剧文化为一炉的结果，使他的剧作具有民族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开放形态。正是他，以自己震撼剧坛，获得强烈持久轰动效应的话剧力作把中国话剧文学和话剧艺术推向成熟，使话剧作为一种新兴综合艺术在中国戏剧史上“立”起来，刷新了对中国戏剧本质的理解，显示出多侧面、多形态的功能。曹禺是潜江人，但他未到过潜江，从童年时代就离开了湖北，应该说从他的作品里是很少能找到楚文化的因素了。但是，象蘩漪那样的“雷雨”性格以及他的剧作中的“雷雨”性格系列，还有那颇带神秘色彩的命运观念和宗教意识，不都可以看到一些楚人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子么？胡风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构筑了突出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理论大厦。他以文艺美学理论为武器，在“灰色战场”上驰骋，着力于“拥抱一代的精神生活底奔流和冲激”，并写出大量主体精神昂扬的、充溢着“生气气息”的战斗审美的文学批评论文。他是中国现代在文艺研究领域里把哲学、美学理论思维推到高峰的极少数理论家之一，又是培养了文学上一代新人的著名的活动家和组织家。对胡风文艺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主观战斗精神，其渊源显然联结着近现代中外文学优秀传统：从托尔斯泰到

高尔基。从厨川白村到卢卡契，特别是鲁迅的“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和“能憎才能爱，能憎能爱才能文”的突出现实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传统，这些对胡风的影响当然是主要的，但是，楚文化那种把儒家入世主义与道家的激越情怀溶为一体的特征在他的思想性格和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核心中不是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吗？光未然（张光年）以脍炙人口的《黄河大合唱》歌词而著称。他把楚文化特有的丰富想象、浓郁情感和艺术表现上的夸张、象征体系与北方富有理性精神的黄河文化、富于生活实感的民间艺术特征溶为一体；又把对伟大抗日战争的讴歌与古老民族精神的重铸和再造溶为一体，从而使它成为了中国现代歌词的绝唱。欧阳山从《高干大》到《一代风流》，笔墨粗犷、酣畅、洒脱，楚文化的心理因素、艺术特征或与陕北黄土高原的高亢激越情调相融合，或与绚烂多彩的珠江文化圈的生活斗争、风物人情交织在一起。与上述作家相比较，叶君健算得上是最具有面向世界潮流的开放型特点了。他在四十年代就把安徒生的一百四十八篇一百多万字的童话佳作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他去过八十多个国家，通晓五、六种外国语，用英语创作出概括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全程的“唯一史诗性”作品——长篇小说《土地》三部曲和《寂静的群山》三部曲。他在楚人中，可以算得上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位奇才了。除了上述这些著名的作家、理论家和翻译家以外，还有余上沅、废名（冯文炳）、胡秋原、丽尼、聂绀弩、黄钢、邹荻帆、绿原、曾卓、冀沅等人。

从上面现代鄂籍作家的简略巡礼中可以看到，这些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能够促使我们思考评价研究鄂籍作家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应该怎样来评价研究现代鄂籍作家呢？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标准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需要几种价值取向的综合方能较为有效地对他们进行剖析。

其一，是社会历史的研究批评标准。从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评价现代鄂籍作家，一定要对文化问题有正确的理解。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基本观点，我们讨论作家作品的文化构成，不论是表层的还是深层的，都不能离开这个基本观点。同时，从事实看，现代鄂籍作家与中国大多数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一样，都注重文学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的历史的内容的反映和概括，其中自然包含着对政治的不同程度的关注，或者说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无法脱离政治。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现代作家都是生活或战斗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斗争激烈、革命运动频繁的年月里，他们的创作都或近或远、或显或隐地与社会政治生活相联系，特别是与政治文化相联系。鄂籍作家地处中原地带，这个特点更为明显。例如，闻一多、余上沅、废名、曹禺等人都曾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精神的洗礼，都曾在五四运动激发过反对专制制度和爱国救亡的政治热情；胡风、张光年、欧阳山等人的成长经历都与中国革命的深入、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更出现了个体意识与民族群体意识、社会政治意识交融叠合，人的解放和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交融叠合。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鄂籍作家，包括鼓吹过“文艺自由论”的胡秋原都不能不关注与投入抗日救亡的血与火的斗争，人民解放战争也给他们以强烈的震动。德人恩斯特·卡西尔曾说过：“不仅应当在人的个人生活中而且应在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去研究人”^①。政治发展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价值选择和理想，并非是一个纯粹实用的过程。政治的发展应当是人自身的发展

^① 《人论》第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展，不单是物的或自然的发展，政治又总是与政治文化的存在同步的。而政治文化，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把它理解为有别于政治的“实际作为”的政治的“基本倾向”，即“政治的心理方面”，“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① 深受楚文化熏陶的古代鄂籍作家，因为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早就与楚文化相交融，所以早就有关注政治的传统，忠君爱国的屈原因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著称，张居正更是“勋表救时”的明代大政治家，即使是以隐士著称的孟浩然也曾孜孜于“忠欲事明主”的仕途，归隐时仍然“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不能忘怀于政治。主张性灵的公安三袁也曾尖锐地揭露政治黑暗，并在“有身如桔，有心如棘”的政治轭制下以皈依于自然、皈依于自然人性而对世俗社会和封建礼法表示抗争和反叛。现代作家这种情形就更突出了。无论是闻一多、胡风、张光年、胡秋原、欧阳山，还是曹禺、废名、丽尼等，他们的作品都力求反映或表现时代精神，容纳尽可能深广的历史的现实的内涵，同时又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特别是与普及到中国社会心理中的有着悠久传统的政治文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与其说是一个特点，不如说是一种长处。

其次，人类文化学特别是地域文化学的标准。在鄂籍作家来说，就是要看到他们与荆楚文化的内在联系。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要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化交流、本国各系文化的相互交融以及在现代意识观照下来看到楚文化的变异中的承传、整合中的个性。在古代，虽然楚文化早已交融了北方儒家文化的理

①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性、入世精神，撷取了江南道家文化独立逍遥、真率不羁的神韵。然而在整个中华大地封闭自守的情形下，在国内现代性交往尚未出现的情形下，鄂、湘、川、黔一带，楚文化的特点是鲜明突出的。解放后特别是在新时期的当代中国，作家们在文化反思的潮流中开始自觉地追求赋予创作以地域文化的特点，因而在“寻根”热中，楚文化的特点也较为鲜明地呈现在当代作家的创作中。而在现代，鄂籍作家一方面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途中极力向外地（包括国内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生活之中也无暇思考，追求创作与楚文化的联系。加以湖北处于荆楚腹地，具有一种半开放半封闭的地理位置和半商品经济半农业自然经济的经济地位，因而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有着更多的变异，在与现代文明的整合中，楚文化带有更多的现代色彩，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楚人长期以来特有的文化心理因素和艺术素质的“积淀”，家乡故土所留下的“童年记忆”，都仍然使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保留着楚文化的印痕。不看到这一点，则难以深入到作品形象世界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去。马林诺夫斯基论及文化时说：“人工的环境或文化的物质设备，是机体在幼年时代养成反射作用，冲动，及情感倾向的试验室。”^①这里指的就是方域文学的特点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作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上面所介绍的作家中，大多可以看到楚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如情感的浓烈、想象的丰富、色彩的绚丽、个性的自由奔放、性格的真率不羁、艺术手法的象征变形等。这从闻一多的诗、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曹禺剧作中的“雷雨”性格系列，张光年《黄河大合唱》的总体的、多层次的象征表现体系中可以窥见其内蕴。

再次，是审美的、文体变革的标准。鄂籍作家有着多种美学

^① 《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费孝通译。

追求，风格各异，创作个性鲜明。他们不只是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等的外在关系，还重视文学的内部规律，特别是在新文学文体变革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小说有废名、欧阳山，戏剧有曹禺、余上沅，散文有聂绀弩、丽尼，诗歌有闻一多、张光年、绿原、曾卓，文学理论批评有胡风、胡秋原等。只要稍加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鄂籍作家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论各种文体变革上都有真正属于本文整体结构形态的变革。不仅仅是语言工具和表现技巧，而且对旧的形式规范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并从语言形式、语象世界和语义体系三个层面上创立了新的结构形态，真正实现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文学本体的变化。例如，为人们最不熟悉的戏剧理论家余上沅，在创立新的戏剧结构形态上所作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他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戏剧名著，以话剧的散文化、生活化和口语化特征取代了我国传统戏曲以唱为主的韵文特点，把戏剧从剧本到舞台艺术、编导演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在理论上对话剧形式的建立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在五四落潮时期出现的他的戏剧理论还不同于胡适、傅斯年等人主要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戏曲上下功夫，他还注意到了戏剧的民族化，着力在中西戏剧文化的融合上作出了努力。他认为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他坚信二者的“不期而遇”将得到“最终的调和”，从而建立起民族化的中国戏剧。他的这些见解早在二十年代便得到了较充分的阐释，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又如胡风的文学理论批评，在建立自己的独立体系时也深入到了文体变革上。他的文论不仅在外形式上出现了一系列独特的现代的概念、范畴体系，又在内形式上提出了思维格局、思维方式上的新路数。这样，他便在文论的本体变革上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上面关于现代鄂籍作家研究的一些意见是根据我在本省第二届现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扩展写成的，只是一些随感式

的东西，谈不上深入的研究。现在不揣浅陋发表出来只是为了就教于大家，特别是就教于对这方面问题有专门的深入研究者。

1990.6.于桂子山

文化的根基与文学的发展

——新时期湖北文学话题之二

蔚 蓝

在新时期文学的诸神大合唱中，湘音显得格外气势恢宏，相比之下，近邻的湖北则有些中气不足。这留给我们一个值得探寻的话题，为什么同处古楚文化圈，共有着楚文学的粗大根系，而衍生出的枝干竟有如此区别。

最让人遗憾的是，史学家的论著中，一般把青铜冶铸工艺、丝织刺绣工艺、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庄骚文学、美术乐舞看作是营造楚文化高堂邃宇的六大支柱。且据此说不论是有限的传世文献体现出的精神文化，或是丰富的出土文物所展现出的物质文化，都昭示着我们湖北域内曾占据着楚文化的腹心地位。即便是作为楚人先民尊崇的凤的形象，在湖北的文物中，它的体形和姿态的各种多样，它的应用之广都远非湖南境内出土所能相比的。尽管在漫长的历史绵续中，楚文化已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变得更丰富、多元，并逐步地汇入和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中，但作为历史上曾有过的一个整体、博大的文化体系，它的文化模式必然会给处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子民打上鲜明的烙印，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化行为，并且通过带有群体色彩的文化质点，通过在民俗、语言、伦理、生产生活方式、思维特征、社会关系所体现出的地方特色中保留和传承下来，形成一种决定群体行为的文化动力。可以说，推涌着新时期湖南文学创作向前发展的，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楚文化的原动力，而我们湖北文坛却失却了这

种强大的文化的原动力。

所以，以古楚文化做为比较的基点，我们不妨可以对湖北和湖南的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总体印象做一参照对比，这或许能为湖北的创作提供某种启示。

文化：类聚走向与散点透视

当新时期文学逐步走向深沉，由最初的控诉、感伤和政治反思而进入文化反思层面时，文化意识便自觉或非自觉地在作家创作中凸现出来。文化意识的觉醒，不仅体现出作家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也体现出作家一种新的文学追求。他们将目光投向更深的层次，越过社会显性的政治、经济层，而深入到社会隐性的文化深层结构中去，通过文化的视角去观照现实生活对历史积淀的传达，去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并由此来识解当代人生与心态。总之，从民族文化中吸取创作津液，力求在历史和现实的更高层次上实现文学创作的大突破，这已成为新时期文坛的一种主体意向。

最早产生了对文化的自觉的是处在楚文化之地的“湘军”。作为文学探索潮流的领头人的韩少功，基于对新时期初端创作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单调、模式化的表现角度、创作手法的逆反，提出了“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文学探索命题，在中国文坛上打出了“寻根”的理论旗帜，通过创作实践去溯寻楚文化的流向，以艺术成果来印证自己的理论。实际上在理论提出之前，从湖南那些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作品中表现出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就已经显露出湖南作家对自己所处地域文化的特别关注和有意描摹，其后湖南作家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中起到一种中坚作用，从所描绘的风俗画面中表达出独特的文化审美情致。应该说是先有了创作的自觉，继之有了理论的自觉，并在理论的统摄下回于创作的二度自觉。

对文化的自觉，使得“湘军”不论是创作群体还是创作个体都具有了其他所无法混同的特质，共同的文化背景并未淹没个性，反而衬出艺术个性的不同。尽管湖南写实作家在总体创作倾向上有相似之处，都以真挚的情感直面生活的真实，体现出现实人生的深刻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特色，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这正是“湘军”能在文坛上以群体的力量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具体到对人生的把握，对文化的审视角度上又能体现出各自的文化审美差异，使古华、叶蔚林、莫应丰、刘舰平、彭见明、肖建国、孙健忠等处在同一写实风格层面的作家又显出创作上的不同个性。即便在突破了传统的审美观念，在观照视点 and 艺术手段上进行新探索的作家那里，多维的审美思考使彼此之间艺术风格分岔极远，如韩少功的文化寻根小说、何立伟的诗化小说残雪和徐晓鹤借鉴现代派手法创作的小说等等，其中的地域文化表征仍很突出。近年来湖南小说群在艺术个性探索中逐渐分流，但不同的作品和人物之间依然有着潜在的文化联接与文化默契。鸡头寨的丙崽、芙蓉镇的胡玉音、放排的盘老五、黄泥街上的王四麻、做荷粑粑的吴婆等等，不管被作家用何种观念与手法所塑造，他们都具有特定的地域文化构成中的诸种特征，体现出文化的人格化。所以从不同个体显现出的创作特质中，仍可把握到这一地域群体的创作心理特质的某种信息。

如果对湖南作家略作接触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对文化的自觉几近成为一种强烈的创作责任。作家都从自己立脚之处寻找题材并注入强烈的文化意识，这就有了作品充满湘北地方色彩的翁新华、彭见明，专写“山”文学的邵阳作家群，写黄泥街的残雪，写湘南五岭山区的古华，湘中的韩少功、刘舰平、何立伟，写湘西的孙健忠、吴雪璐、蔡测海，大家通过不同区域看文化，便有了独特的眼光，也使作品有了个性色彩。

相对地，湖北文坛却缺少对文化的普遍自觉。诚然我们可以

找到种种切实的理由为自己解释，那就是曾同处古楚文化之地的湖北，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比湖南更加开放。商业发达，讯息流通，城市日益大都市化，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失去古老的原生的地域文化色彩。同时，日益层叠互渗的文化网络也使湖北作家创作面临着多种参照选择，或开放的城市，或闭塞的乡土，或城乡互涉复合，已不可能形成湖南文坛那种对文化的类聚选择，而是呈现出对文化的散点透视倾向，相对地减弱了地域文化的总体特征。

其次，湖北作家也很难做到象湖南作家那样，从做为小说叙述载体的语言中显示出浓烈的地方文化色彩。对湖南作家来说，这既有周立波注重对方言的提炼和运用的文学传统的影响，也有更贴切生动地表现民情风俗的自觉需要，通过方言乡音显示蕴藏其后的文化特质，让读者体味到三湘特有的文化个性。就是在手法极现代的徐晓鹤的作品中，也运用着极地道的方言。而湖北方言属于大北方语系，又包容几种存在差异的地点方言，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各种语音杂糅，产生方言变体，语言中原生的地域特征相对减弱，因此，不易把握这种特点不突出的语言载体，并从中显出比较集中的湖北文化特色。尽管几年前方方在《闲聊宦子塌》中，曾通过自己的努力做过一次成功的方言尝试，但在湖北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仍不多见。

再有，湖北缺少象湖南那样土生土长，创作扎根于本土文化，又在中国文坛上具有开创文学风气之先的写作大家的影响。如湘西之子沈从文，他的创作从题材内容到自然清灵的艺术风格都与湘西血肉相连，这种文学传统其后被新时期文坛颇有影响的韩少功、古华、叶蔚林所师承，他们各自肯定着做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湘西、湘中或湘南。他们的领头作用，无疑形成一种巨大的文化凝聚力，使湖南文坛出现集体弘扬地域文化的创作态势。而湖北文坛有全国影响的姚雪垠、徐迟、碧野这一代老作家，他们